

# 关于性工作者的瑞典模式的真正影响

## #1

### 瑞典的废娼主义者理念， 及异议消声模式

## 瑞典的废娼主义者理念，及异议消声模式

### 介绍

瑞典1999年开始实施的关于买性的法律，是对买方刑事定罪<sup>1</sup>，而不是卖方。自从该法律的实施，其他国家也开始效仿瑞典<sup>2</sup>，采纳这种法律。在这个过程中，支持和反对这种法律的两方持续进行着运动和倡导。

在瑞典和国际上关于“瑞典模式”的辩论中，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权利组织的发言总是被有计划的消声。因此，本文旨在厘清性工作者是如何被消声的，他们的证言是如何被以各种方式削弱的。这些，我将称之为“消声模式”。

在“消声模式”的背后，是瑞典对性工作的理念。这理念也影响着瑞典服务机构对性工作的理解和对待性工作者的方式（服务机构及其服务将在文件三中进行阐述）。这些关于性工作的理念支持着瑞典模式。本文旨在分析与击破这些站不住脚的理念。

### 在瑞典，性工作是如何被理解的？

在瑞典，性工作<sup>3</sup>被认为是一种针对女性的暴力形式，而且在过程中也充满了对女性的暴力。人们认为性工作不可避免地永远与暴力、虐待和剥削相联。性工作者的客人都是男性，性工作者是受害妇女。这些观点的背后是一套国际女权主义视角，称为“激进女权主义”和“(新)废娼女权主义”（也包括一些变形与混合，如激进废娼女权主义等等。NSWP称之为‘原教旨女权主义’，虽然不会在主流瑞典话语中使用）。基本上，这些女权主义作者和活动家期望的是对性工作的废除，因为性工作是社会疫病。他们希望这能够改变女性的父权从属地位。

### 所有人都同意这个主流瑞典理念么？

并不是。有这几个理由。首先，并不是所有的性工作都是暴力或问题频出的，当然这些肯定存在。性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存在大量变化，这使得相关联的暴力和伤害程度也大不同。不同的性工作的环境与一定水平的暴力相关联。环境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暴力伤害也不是永远不变的。

而且，很多性工作者不把自己当做受害者。很多人强调他们的工作中的主动性和自主决策。性工作的动机和经历也是多种多样的。上述原教旨女权主义者的信条认为性工作者是无助的（顺性<sup>4</sup>）女性，她们的客人是男性。这完全无视了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以及女性和LGBTQ客人：并不是所有的性工作者都是顺性女性；也不是所有的客人都是异性恋男性。

因此，在使用废娼论女性主义的粗暴分类来看上述问题的环境中，很多瑞典或国际组织（性工作者权益组织和工会、社会和医疗服务机构、学者、活动家、相关政治人士）力图将性工作的参与内容复杂化。他们试着去质疑将性工作概念化为一种暴力形式的表述。这种表述认为性工作不可避免地被暴力围绕，这种简化论思维掩盖了变化与差异。

在瑞典和国际上关于“瑞典模式”的辩论中，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权利组织的发言总是被有计划的消声。

1 由于对买性定罪，这项法律就不应当被称为“去刑事化”（即使技术来说，卖性服务是去刑事化的），因为概念是指将针对性工作的法律全部废除。这项法律可以称为“部分刑事定罪”。

2 挪威和爱尔兰对买性刑事定罪，这项法律在英格兰、苏格兰、北爱尔兰和法国都得到提案。

3 本属文档使用性工作与性工作者这两个词，是为了强调性工作中劳动的合法性，这两个词在瑞典主流话语和政治讨论中都基本不存在。瑞典相关人士使用的代替的词汇是“卖淫”和“娼妓”，尽管世界各地的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权益组织都认为这些词是贬义的。

4 “顺性”是指个体的性别认同与他们出生时的性别相符，与“跨性别”相反。



很多工具都用来消除性工作者的发生，使那些普遍共识在建立时不会受到真正的挑战。

## 这些声音影响瑞典关于性工作的共识了么？

没有，尽管不断在瑞典的政治层面强调性工作者本身应当参与政治辩论与讨论。但是性工作者被有计划地排除在外，被消声了。

瑞典是一个现代派国家，有很长的社会工程历史，在许多问题上都建立了共识。这意味着，很多威胁破坏瑞典成为人人相同的统一福利国家的群体，都受到了不同形式的控制与干预。在19到20世纪，这些群体包括女性、性工作者、男同性恋者、吸毒者、移民和其他被视为先天缺陷的人。控制的防止包括将性传播疾病（如HIV）患者强制监禁（现在仍然如此），对吸毒者强制监禁与治疗（这也是现在仍然如此），对很多人进行绝育（20世纪70年代中期停止；直到2013年，希望做变性手术的跨性别者仍被要求先进行绝育）。

但公开的强迫与隔离并不是瑞典进行控制与排除的唯一方式。控制的方式经常包括将异端反抗群体消声。以性工作为例，很多工具都用来消除性工作者的发生，使那些普遍共识在建立时不会受到真正的挑战。这些工具，我称为“消声模式”直接来自于激进女性主义者对性工作的看法，与对瑞典性工作的社会建构相似。

消声模式可以很复杂，狡猾地将不利于瑞典对性工作的粗暴概念的观点边缘化。但是，这些模式涉及的知识，可以有效地用于消解这些消声工具。

消声异议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方法（有时相互交叉）：展示每种方式时都会给出引文举例。



## 消声模式1

# 虚假意识

“虚假意识”是一个较老的概念（由恩格斯在19世纪创造），指断言某个群体没有能力完全理解自己的处境或动机。即，认为某些人不能“客观地”自我认知。因为这个群体或个人的自我知觉已经被损伤了，所以他们的主观视角和证言也是受损的，不能显示他们的“真实”处境。

有很多理由去解释这种自我认知的缺乏。这种方式被用来消除不同群体的声音，因为他们可能会动摇社会共识。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群体受到这种损害，如工人阶级、被视为劣等的民族/种族、吸毒者、LGBT人群和性工作者。

在瑞典在激进女权主义者文章中，普遍的观点是认为性工作者的想法来自于虚假意识。这种观点经常用以下几种假设进行解释：

## 创伤损害自我知觉与选择

认为性工作者在性工作的经历中受到了巨大创伤，或看到前辈在性工作中受到的虐待，导致他们不能正确地认清自己的处境，而要通过性工作来重演虐待经历（必需的虐待）。在瑞典全国卫生福利理事会上，一名顾问很好地总结了这种对性工作的观点：

**“认为如果你是这么（自愿性工作，非虐待）看待你的处境，那这是因为，你在重演过去的创伤，或者你受到了创伤，重演之前的性虐待……或者你因为虚假意识而受苦。”**

（访问，2010，关于性工作，高级顾问）<sup>5</sup>

当对个体经验进行分析时，这个消声模式就立不住了。如前文所述，性工作的经验和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正如瑞典全国卫生福利理事会的高级顾问所批评的那样，个体经验和动机有巨大差异的群体，被简单地塞到了一个相同的类别里：

**“这些人，你放到了一个类别里，认为，嗯，说到底，都是一样的，就算你卖性服务一个月挣5000欧元，你不需要中介，你是独立的……你和那些被第三方强迫卖性的人是处在同一个地位的。”**（访问，2010，关于性工作，高级顾问）<sup>6</sup>

## 绝望伤害了真正的选择

认为性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受到极大压制，以至于即使她们表示出于“选择”从事性工作，那也是因为她们的选择太有限。选择有限是因为性工作者都被视为是贫困潦倒，精神不稳定，有酒精或药物依赖。

对付这种消声模式，我们指出，主观能动性和“选择”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有限的，而不是仅与性工作或性别等相关。关键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极少有人在选择挣钱方式时能够真正进行完全“自由”的选择。而且，要强调很多性工作者是出于各种理由，在不同挣钱方式中选择了性工作；很多性工作者不是出于绝望才卖性服务的。

**要强调很多性工作者是出于各种理由，在不同挣钱方式中选择了性工作；很多性工作者不是出于绝望才卖性服务的。**

5 Levy, J., 2014. 对买性刑事定罪——瑞典教训 (Routledge)

6 Levy, J., 2014. 对买性刑事定罪——瑞典教训 (Routledge)



## 家长制的教化损害了客观性

由于家长制压迫环境中所受的教化，性工作者被认为不能看清所受的压迫/镇压，无法看清自己的“真实”处境。因此，断言性工作者错误地平常化了他们的性工作。用这种观点去消解性工作者的声音，无论他们是表示自己在工作中有主观能动性，还是强调自由从事性工作，或是表示从工作中得到快乐，或表示自己的工作并不是有问题的有伤害性的。这种观点极为居高临下，体现了家长作风（考虑到某些女权主义者在拥护这个观点，实在是讽刺），只允许一部分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声称看穿了父权压制结构），要求另一部分沉默。

虚假意识模式告诉人们，只有部分性工作者的观点是可被接受的，就是那些符合废娼主义者关于性工作固有暴力虐待元素的理念的。那些不这么解释性工作的观点则不被接受。因此，由于性工作在瑞典是被废娼主义女权分子所定义，性工作者在谈论自身经验时就遭到贬低。除非他们接受主流对性工作的理解，或停止性工作并承认后悔性工作经历。

**这种观点极为居高临下，体现了家长作风(考虑到某些女权主义者在拥护这个观点，实在是讽刺)，只允许一部分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声称看穿了父权压制结构)，要求另一部分沉默。**



## 消声模式2

### 撒谎和逞强

这个模式不仅消除了性工作者的表达，也损害了重视性工作者的表述的分析与研究的可信度。

除“虚假意识”以外，另一个理论是性工作者在谈论自己的观点、经历、动机和生活时，是在撒谎或逞强。因为性工作一般是痛苦的创伤性的，所以性工作者是想要掩饰自己工作的“真实”情况。

相关方如斯德哥尔摩娼妓工作组（国家支持的组织，为性工作者提供社会服务）的成员和瑞典警方成员，都表示，直接与性工作者对话（或相信性工作者）得到的是扭曲不实的证词。如虚假意识一样，这个模式不仅消除了性工作者的表达，也损害了重视性工作者的表述的分析与研究的可信度。

斯德哥尔摩娼妓工作组曾经在不同场合（包括与瑞典全国卫生福利委员会交流）时声称，他们自己听到了性工作者的真实声音。一名来自娼妓工作组的人表示，如果直接访问，性工作者会“演戏”并“逞强”，这损害了他们的证言：

“如果有人访问我，如果我是名性工作者……我们大多数人会逞强，说实话，谁想找一个悲悲戚戚的妓女啊？我是说，卖淫就是演戏，你想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我好色，我高兴……如果在街头哭泣，是不会有客人的。但这都是演戏。对于访问实际从事性工作的人，这就是困难之处。”

（访问，2009，社工，斯德哥尔摩娼妓工作组）<sup>7</sup>

这种相关方，将自己的声音显得很可靠，却使性工作者的声音在讨论中处于不利位置。

<sup>7</sup> Levy, J., 2014. 对买性刑事定罪——瑞典教训 (Routledge)



## 消声模式3

# 不具代表性的观点

这种消声模式主要用于前两种方式不起作用的时候；当发现那些性工作者不能被消声，而且他们的赋权与行动获得了认可能够参与辩论的时候。

除了声称性工作者的表述来自于虚假意识或掩盖事实之外，还有一种理论是说，与主流观点不同的那些不能代表广大性工作者。

这又要说到，这种观点意味着，性工作是有个客观“真相”的。这种消声模式主要用于前两种方式不起作用的时候；当发现那些性工作者不能被消声，而且他们的赋权与行动获得了认可能够参与辩论的时候。总之，无法证明性工作者都是没有自我知觉能力或在撒谎时，就声称那些观点不能代表广大性工作者的经历。

2013年卫报<sup>8</sup>中瑞典国家警察 Kajsa Wahlberg 的话语，体现出如何使用这种消声模式：

**“我们有一小撮支持性工作的非常有力的说客。买性法令不是为他们设置的，是为那些在性工作中受苦的大多数妇女设置的。”**

在这里，Wahlberg，作为一名买性法律的拥护者，声称那些发出声音的性工作者只是一小撮有力的说客。在瑞典，想要表达自己生活或经验的性工作者就这么被消声了，被认为是不具代表性的：他们不是“大多数”。那些被认为是“真正”代表大多数的人无法为自己发声，因为他们要么是有虚假意识，要么是在说谎逞强，一些相关方就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我们可以看

到，女权作家 Sheila Jeffreys，作为将买性刑事定罪的支持者，是如何从国际激进女权主义理论中巧妙地抽出这个观点的。在以下引文中，Jeffreys既打压了一些性工作者的声音，又选择性地支持了其他观点：

**“即使某些娼妓权利组织为卖淫赋予一个积极的表象，一旦女性开始讲述他们的经验，很明显多数妇女要谴责卖淫的压迫，而不是唱赞歌。”**

(Jeffreys 1997, 79页)<sup>9</sup>

与之相应的是瑞典反卖淫与人口贩卖国家协调员的观点，他也强调，那些直接发声的人，是“错误”的信息来源：

**“你必须找到对的人……如果你在报纸上登个广告，写‘如果你是妓女，或在性产业工作，请回答这个问题’，那些回答的人都是错误的人选。”**

(访问，2009，斯德哥尔摩)<sup>10</sup>

另外，这种消声模式也用于对付那些不是顺性女性的性工作者。因为瑞典模型的基础就是将性工作定义为男性压迫女性，无视跨性别与男性性工作者的存在。他们的声音就必然不代表广大性工作者。尽管一些瑞典组织，包括南部的马尔默娼妓工作组，都曾经强调，瑞典可能出卖性服务的男性要多于顺性女性<sup>11</sup>。

8 Thompson, H., 2013, 《卖淫：为什么瑞典认为他们做得对》，卫报，12月12日，链接：<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13/dec/11/prostitution-sweden-model-reform-men-pay-sex> (2013年12月24日最后登陆)

9 Jeffreys, S., 1997, 卖淫的概念 (Melbourne: Spinifex Press)

10 Levy, J., 2014, 对买性刑事定罪——瑞典教训 (Routledge)

11 这有关一项近期研究，参见法新社/地方，2012, 《在瑞典男性卖性多于女性：研究》，链接：<http://www.thelocal.se/20121113/44386> (2014年2月1日最后登陆)



## 消声模式4

# 对发声者及其言论的漫画化或妖魔化

在第四种模式中，对那些不符合激进女权主义对性工作的建构的人，他们的观点被夸张或扭曲，如性解放，积极支持性工作，或支持乱交等。对瑞典将买性刑事定罪的法律的批评，就曾经被攻击和妖魔化，不仅是性工作者被谴责为拥护支持“性产业”，LGBT组织成员、服务机构、学者、和社会工作者遭到这种谴责，就因为他们批评买性法律及其意识形态理念。

这是对人不对事的做法：不是观点，而是提出观点的人遭到损害，从而使他们的观点受到怀疑。这种消声模式，是在其他方法都失败的时候才出现，不能打倒观点，就打倒提出观点的人。

这种消声方式不仅是瑞典在用，各国都在用。个人或组织着重用人权为基础（与废娼相反）的方式对待性工作时，就会被废娼主义激进女权者谴责为支持性工作，甚至与皮条客和人贩子是同伙，以此损害他们的观点。

**“因为相信没有人会选择卖淫为生，CATW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工作权利倡导者就是皮条客和人贩子的同盟。（CATW是反人口贩卖联盟，一个废娼组织）**

(Doezema 2010, 第134页)<sup>12</sup>

**这是对人不对事的做法：不是观点，而是提出观点的人遭到损害，从而使他们的观点受到怀疑。**

<sup>12</sup> Doezema, J., 2010, 性奴与演讲大师——人口贩卖的结构 (London: Zed Books)



## 总结

正如所有那些声称关于某个社群或社会团体有一个绝对“真相”的观点一样，瑞典对性工作的概括化也是有着固有缺陷的。为了维护拙劣的主流观点，废娼主义激进女权分子采用了四种主要消声方式，来削弱性工作者的表达和对买性法律的批评：

- 1 虚假意识模式
- 2 声称性工作者在撒谎或逞强
- 3 表示批评法律的性工作者不具代表性
- 4 漫画化或夸张对方观点，进行人身攻击，以期损害对方观点，转移焦点

这些消声模式都非常有力：他们可以前后轮流使用，消除那些与原教旨女权分子理论不符的主张，无论是来自性工作者、性工作者活动家、性工作者盟友、学者还是其他人。使用这些消声模式，使人无法听到那些与主流看法不同的性工作者的声音，买性法律的支持者就能够在毫无对手的情况下推广自己的理念。

解剖这些消声模式，就能在质疑瑞典模式的基础理念时对付这些模式。

**解剖这些消声模式，就能在质疑瑞典模式的基础理念时对付这些模式。**

## 相关阅读资料

本工具包的四篇文献来自于Jay Levy博士的2008-2012年在瑞典进行的研究。完整研究可见于：

- Levy, J., 2014, 对买性刑事定罪——瑞典教训 (Abingdon: Routledge)

除了这本著作外，还有其他有用的文献。

瑞典政府立法概要和法律背后的基础理念，参见：

- 工业、就业和交通部，2004，《卖淫与人口贩卖》（斯德哥尔摩：工业、就业和交通部），链接：[http://myweb.dal.ca/mgoodyea/Documents/Sweden/prostitution\\_fact\\_sheet\\_sweden\\_2004.pdf](http://myweb.dal.ca/mgoodyea/Documents/Sweden/prostitution_fact_sheet_sweden_2004.pdf) (2014年7月6日最后登陆)

瑞典在买性法律出台前的辩论综述，参见：

- Svanström, Y., 2004, 《对男子刑事定罪——瑞典性别模型？》，出自《卖淫的政治——女性运动，民主国家和性贸易全球化》，ed. Outshoorn, J.: 第225-244页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为瑞典模式的基础，废娼女权分子对性工作的分析，参见：

- Dworkin, A., 1992, 《卖淫与男性霸权》，见于《卖淫：从学术到行动》，密西根大学法律学院，10月31日
- Ekberg, G., 2004, 《禁止购买性服务的瑞典法律——干预卖淫和人口贩卖的最佳实践》，《针对妇女的暴力》10, 10: 第1187-1218页
- Jeffreys, S., 1997, 卖淫的概念 (Melbourne: Spinifex Press)



The Matrix, 62 Newhaven Road  
Edinburgh, Scotland, UK, EH6 5QB  
+44 131 553 2555  
[secretariat@nswp.org](mailto:secretariat@nswp.org)  
[www.nswp.org](http://www.nswp.org)

NSWP is a private not-for-profit limited company.  
Company No. SC349355

**BRIDGING THE GAPS**  
Health and rights  for key populations